



扫一扫

更多精彩活动和免费礼品等你来

“延安精神”怎样打动外国人



美军观察组

1944年的夏天,代表着民间的21名中外记者组成的西北观察团来到延安。随后,代表着官方的美军观察组来到延安,组长由美国驻华使馆的武官包瑞德上校担任。他们的职责是搜集共产党获得的日军情报,了解共产党军队的情况和营救美军飞行员等军事合作。包瑞德在成为美军观察组的组长之前,就已经学了一口流利的中国话,成了一名中国通,但他的眼中总充满着怀疑和挑剔。

当时,贺龙特意将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的一批条件较好的石窑给腾出来,留给美军观察组使用,后来,许多外国记者也在这里居住。抗日战争期间,延安的环境就是如此,人们大多生活在窑洞里,但是对于那些刚刚来到延安的外国人来说,新鲜感一过,麻烦也就来了。

美军观察组的住所是一排八孔窑洞,这在边区绝对算是高规格的住房了,但用他们自己的话说,这里太简陋了,简直就是一处斯巴达式的住所。住在这里也确实艰苦了点,在盛夏的多雨时节,暴雨的湿气让墙皮开始脱落,屋内潮湿阴冷,湿气会使屋内的皮革制品发霉;晚上睡觉如果忘了关门,地上的爬虫、天上的飞虫会成群结队地来骚扰你。到了冬天,屋内更是寒冷彻骨,他们只能拿个脸盆烧点炭来取暖,而为了防止一氧化碳中毒,还得开着门

窗,吹着冷风,一边烤火一边发抖。千里迢迢赶赴延安,却遭了这么大的罪,那么美军观察组的成员们有何感想呢?有趣的是,多年之后,每当有人和他们谈起当年在延安的种种艰苦时,他们总是会带着一种欣喜、一种美好的感情去回忆那段往事。

包瑞德的报告

在美国国家档案馆珍藏着一份报告,日期是1944年7月28日,这是美军观察组来延安的第6天。报告是组长包瑞德申请发送的,作者是美军观察组成员谢伟思,其中写道:“我和观察组其余人员的初步印象一样,这里是极其讨人喜欢的。外国记者,至少两名记者的印象同样如此,这两名记者来到延安之前,绝对不可能是‘亲共分子’。中国共产党人的魔力持续存在着。”

那么,这些外国记者和美军观察组的成员,到底在延安看到了什么,让他们在短短几天之内,竟然觉得条件恶劣的延安是极其讨人喜欢的?

刚来第一天,这些美国人便和八路军官兵打成一片,热火朝天地修机场,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由于延安机场长时间空置,设施简陋,美军观察组的飞机到达时,由于跑道不平,差点酿成事故。所以,当他们平安下了飞机后,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便急忙调来一队人整修机场。美军观察组本来只是在一旁看热闹,可不久,他们便发现,叶剑英也出现在干活的人群之中。

身为八路军参谋长的叶剑英在军中地位仅次于总司令朱德和副总司令彭德怀。但这位身居高位的将军,竟然亲自上阵干起了粗活。

在场的美国人惊呆了,别说在国民党的军队,就是在美国军队,他

们也从未见过这样的军官。

叶剑英的出现,触动了在场的每一个美国人,他们一商量,便挽起袖子,加入到干活队伍中去。一时间,机场上空的劳动号子,越发豪迈。

“延安精神”的感染

外国人一到便帮忙修机场,延安城里从没见过外国人的老百姓听了这个消息,都想看个新鲜,于是扶老携幼,到场围观,最后竟然连毛泽东也来到了现场。

就在这一天,在这个机场,“延安精神”感染了在场的每一个人。这些刚刚到此地的外国人,虽然无法理解“延安精神”的精髓,但他们对延安的感受是相同的,这是一个与想象中完全不同的世界。

这里常年被封锁,没有外援,物产贫乏,自然环境又恶劣。但是,外界阻碍却没有给这里带来一丝绝望,传说中的贫穷与黑暗,在这里也找不到一分一毫。在延安,人人一样,生活在窑洞里,一起工作劳动。百姓的吃穿用度绰绰有余,社会治安良好,没有警察,甚至没有乞丐,完全可以做到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这片贫瘠的土地,如何被改造成了世外桃源呢?这些外国人逐渐摒弃延安最初带给他们的震撼,开始冷静思考。他们都是阅历超群、头脑理智的军官和记者,尤其是美军观察组组长包瑞德,他带有的挑剔目光,依旧没有消除。包瑞德曾经在与周恩来路过一个秩序井然的村庄时,就当面质疑过,他们所看到的这整个地区的景象,是否是特意为他们安排的假象?

然而,当这些持怀疑论的外国人深入腹地、追根溯源时,才发现,这一切都是真实得不能再真实的景象。但眼前的这一切,却来之不易。

(据《老年生活报》)

历史短波

毛泽东:你们要守规矩

据记载,刘伯承在与一位高级将领谈工作时曾经说过,1949年刚解放进城,6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主席。当时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讲几句鼓励的话。可没有想到,毛主席开头就说:“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刘帅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刘少奇:你没听群众的话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刘少奇回湖南老家调研,当地炭子冲农会主任不和群众商量,擅自改变良田用途,被撤销职务。汇报时他说:“我没有听毛主席的话,没有听党的话。”刘少奇当即打断:“我看还要再加一条,你没有听群众的话。”

胡耀邦:革命者要有骨头

1975年7月,胡耀邦被重新起用,调任中科院主持日常工作。他在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一次讲话时,曾借题发挥:“我们现在脱离了单纯的脊椎动物,有了脊椎就有了骨头,可以爬行,可以站起来。人没有骨头还行吗?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个革命者,要搞点马克思主义,搞点骨头。”又说:“谁好谁坏,一时弄不清,但埋在地下的化石都挖出来了,历史的面貌是怎么也埋没了,混不清了、歪曲不了、抹杀不了的。”

彭德怀:不要老盯着“小家”

从朝鲜战场回来后,彭德怀住在中南海怀仁堂东南角一个叫永福堂的院落。永福堂由于长期缺乏维修,门窗和廊柱的油漆早已脱落,斑斑点点,显得很旧。办公室天棚一点不漏雨,每逢下雨总是要湿上一大片。管理部门的同志几次提出要房屋进行一次翻修和粉刷,都被彭德怀拒绝了。他说:“哪里漏就补哪里,能住就行了。”他多次嘱咐管理部门的同志:“你们要把心计用在国家这个大‘家’上,眼睛不要老是盯着我这个小‘家’,要把钱节约下来,先用于国家经济建设。”

(本报综合)

抗战前后国民党大办农村合作社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全面推行土地改革,中国农村自下而上开展了大规模的农业合作化运动,逐步完成了由农民个体所有制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转变。殊不知,把农民乃至更多的群体拉进集体生活,也曾经是国民党政府努力实践的一个方向。

陈果夫力推合作社的方式

国民党1927年成立南京政府初期,外部遭受帝国主义的侵袭,内部面临中国共产党开展土地革命的压力以及农村经济枯竭的紧迫情况。当时欧美各国的合作社如火如荼,非常红火,国民党为改善国内千疮百孔的局面,也跟着大搞合作运动,企图在不触动乡村封建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用“温和的土地革命”即“合作制”来替代“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政策,一方面复兴农村经济,更重要的是消除共产党土地革命的影响。

真正在国民党政府推动合作运动中起到至关重要的应数陈果夫。1927年,陈果夫在上海亲自组建中国合作学社,主持学社事务,认为“国民党要实现阶级协调,防止阶级斗争,就应该采用合作社的方式”,他的这腔热忱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社会各界的呼吁,加之“蒋介石在谈到经济和政治问题的时候,也常

常提到合作社的重要性”,使得国民党政府自1928年起,便把合作事业,尤其是农村合作事业作为重要议题来讨论。据不完全统计,1927-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国民党政府所颁布的关于合作运动的法令多达40项,足见重视程度。

集体上操集体吃饭集体劳动

由于上层的重视,农村合作运动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36年,合作运动在全国农村普遍开展起来,各类农村合作社达37318家,社员增至1643670人,到1937年合作社数量增至46983个,社员21396344人。

集体上操,集体吃饭,集体劳动,集体分配,所有家庭生活在一个大集体当中,福建南平南雅镇八仙乡“合作新村”是当时国民党政府合作社的样本。1938年日军侵华,福建南平还相对安全。当时这个村庄刚建成不久,两排平房,一条街道,平房整齐,街道笔直,宛如社会主义新农村。村子西口是一个大操场,操场北边是一个大食堂。

时间是凌晨,操场上响起钟声,村民们陆陆续续来到操场,升旗,唱革命歌曲,做广播体操,然后涌进食堂集体就餐,再回家拿农具,然后在村长和劳动组长的带领下集体劳动。到了收获季节,村干部会按照

每个人的工分来分发粮食。

干部贪污村民急难以为继

抗战前后,国民党在国统区成立了很多这样的合作社,当时村里有“保农合作社”,乡镇有“乡保合作社”,县城有“县合作联社”,城市社区有“消费合作社”,各大工厂有“职工合作社”,买不起房的居民则在国民党扶持下陆续成立了一批“住宅同志合作社”。最后大多以失败告终。

福建南平那种合作新村,由于分配不公和干部贪污,村民普遍产生惰性,消极怠工、偷盗公物。各大城市里先后成立的住宅同志合作社,最后不是变成开发商偷逃税费的工具,就是沦为小官僚私分救济金的手段。以抗战后成立的“杭州市住宅第一合作社”为例,该社共有社员100人,全是政府部门干部。该社成立后,让杭州市政府无偿划拨了国有土地50亩,又通过浙江省政府善后经济处申请了大笔救济款,凭着这些钱和地,顺利建成100套小别墅,然后人手一套分完。

国民党政府企图在不触动原有生产关系的前提下,以合作运动来实现农村经济的复兴,本身就无异于缘木求鱼。随着解放战争的迅速发展,国民党政府推行的合作社日趋减少,逐至全部解体。

(据《民国档案》、《国家人文历史》)